

郭沫若 著

石鼓文研究
詛楚文考釋

考古学专刊

甲种第十一号

石鼓文研究
诅楚文考释

著者

郭沫若

沫

若

编辑者

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

出版者

科学出版社

北京朝阳门内大街一三七号

印刷者

中国科学院印刷厂

经售者

新华书店

1982年10月第一版 开本：787×1092 1/16
198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：21 1/2
印数：0001—4,000 插页：2

统一书号：9031·1

本社书号：1654·9

定价：8.50元

郭沫若 著

考古学专刊
甲种第十一号

石鼓文研究 诅楚文考释

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
科学出版社 出版

出版说明

我国传世的石刻文字以石鼓文为最早，稍后有诅楚文，都是东周时期秦的刻石。石鼓至今犹存，但文字颇多剥蚀。诅楚原石不存，原拓亦早湮没，现存最完善的刊本是所谓「元至正中吴刊本」。

石鼓文研究是著者考证石鼓文之文辞和年代的著作。书中发表了明代人安国所藏宋拓「先鋒本」，并以安氏「中权」、「后劲」二本为之作「夺字补」。初版本一九三九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。一九五五年人民出版社重印。一九五九年著者为第三版写了小引。我社为之校改了个别字，补正了部分附图的比例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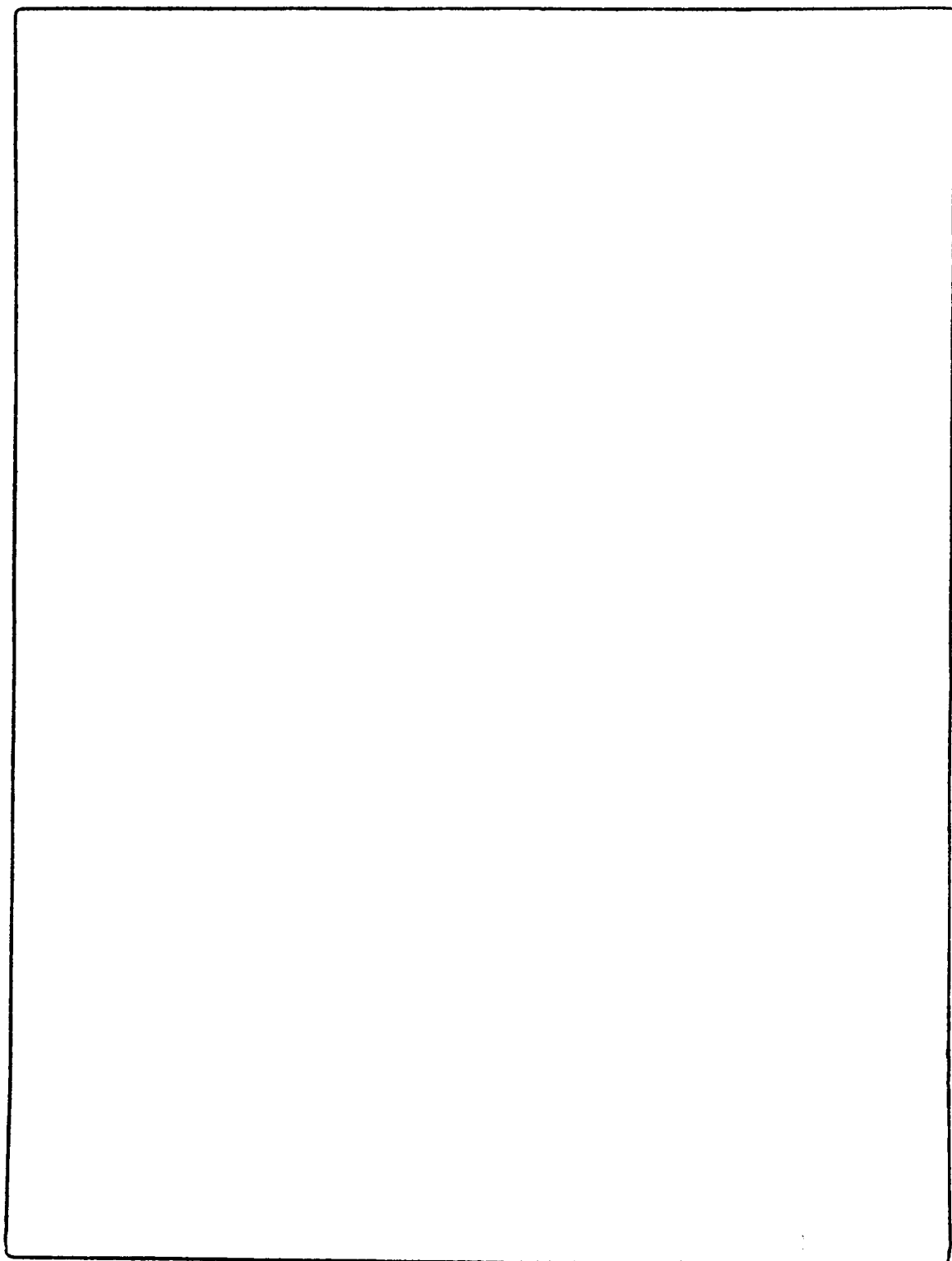
诅楚文考释发表于一九四七年，著者考证诅楚文之文辞及其年代，并考订所谓「中吴刊本」的年代及其中三篇诅文的真伪。我社将吴公望氏旧藏之「中吴刊本」补印文末，以便读者参阅，并借使诅楚文之最善刊本得以流传。

同鼓文研究

增明錫山安氏十鼓金先鋒本
及中權後勁二本諸題跋

一九三六年八月

沫學白署



三版小引

「石鼓文研究」今改由科学出版社印行，重印并定中有之，亦应加改正。

一、石鼓运回北京后，已于一九五八年间翻，陈列于故宫博物院箭亭。

二、关于石鼓年代，唐兰曾主秦灵公三年说，近已自行推翻，谓作于秦献公十一年（周烈王二年，公元前三七四年），又推迟了四十年。

石鼓文中秦自称公，又有「天子」与「嗣王始」之语，自应指周王。由此内证及其他根据，故敢肯定作于秦襄公八年，时周平王元年（前七七一年）。

唐之新說仍先肯定五穀必作于我國年間，但對我所提辯論未加反駁，僅改按上述內証推遲年代，按云「烈王二年還不可以稱嗣王」。新說視旧說若有進境，但其自信似仍未堅。

余意，我國古史，周室已同贅病，對秦世為有效，政質等事，在秦視之，當不致受寵辱焉。故余仍維持袁公二年說，以得更有力量之反証。

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廿八日

郭沫若

附注：唐氏新說見「故宮博物院」刊一九五八年第一期
唐著「石鼓文年代考」。

重印弁言

明代嘉靖年間（十六世紀）的錫山安國是一位有名的藏書家兼印書家。他有過一部銅鑄的活字，曾經印行過好些古籍。他也喜歡收藏石鼓文拓本。在他的收藏品中，有三種北宋拓本最古，他命名之為先鋒本、中權本、後勁本。三本均經翦裝，年代先後相差不遠。先鋒本最古，後勁次之，中權較晚；但中權殘字多被保存，後勁次之，先鋒翦奪最多。故三本雖略有先後，而亦互有優劣。

三本均於抗日戰爭前，被民族文化敗類售往日本，收買者為日本財閥三井銀行的老板，視之為天壤瑣寶，秘不示人。

一九三二年秋，我在日本東京文求堂書店看到一套拓本的照片，共四十二張，並無題跋。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後勁本的照片，是三井的兒子借給朋友看，流散在外的。我見到這套照片，曾寫成石鼓文研究一文，收入古代銘刻彙編內，以一九三三年秋在日本印行。我又把照片寄回國內，由馬衡唐蘭二氏負責印出，當時誤信耳食之言，曾以之為「前茅本」。和這套照片的發現約略同時，上海藝苑真賞社把中權本印行，但要把「權」字磨改為「甲」字，冒充「十鼓齋中甲本」，書後長跋被刪去，以掩其作偽之跡。

一九三六年夏，收藏家劉體智把他所藏的甲骨文拓本二十冊，託人送到東京，希望加以利用，進行研究。我選了一五九五片，編成殷契粹編，以一九三七年五月印行於日

本。當我在從事編纂的時候，東京的一位骨董家河井仙郎聽說我處有劉氏甲骨拓本，他便向我建議：願意把他所珍藏的安國三種石鼓文的照片和我交換借閱。河井是三井的學術顧問，事實上就是幫忙三井收買中國古代文物的掮客。安國石鼓文被三井收買時，正是他從中韓旋的，故他藏有三本的全套照片，即是最初進行交易時由上海送去的樣本。這樣本藏在河井處，他也是諱莫如深，祕不示人的。我接受了河井的建議，因而我就有了機會得以看到先鋒中權後勁三本的全貌。三本照片前題後跋俱全，中權和後勁的跋語也就因而得到了闡明。

河井的照片，我把它複製了。根據這樣難得的資料，我對舊作石鼓文研究進行了一番的修改和補充。整理完

畢之後，我把全部資料郵寄上海沈尹默氏，請他設法印行。
一九三七年七月蘆溝橋事變爆發了，日本軍國主義者
發動了大規模的侵華戰爭，我結束了十年的亡命生活，
回到了祖國的懷抱。這部書的初版是在困難期中，以一
九三九年七月作為弘德研究所叢刊之一，由商務印書館
印出的。印行以來，不知不覺之間已經經歷了十五年了。
人民出版社準備把這部書重印，我趁這個機會把獲得材
料的經過寫在這兒。

這部書的印行，主要的目的就在提供有關石鼓文的難
得的資料。石鼓存世已經二千七百多年，石經風化，有的
已一字不存，存者也十分殘缺。故在今天，我們能夠看到
九百多年前歐陽修梅聖俞諸人可能看過的拓本，實在要

算是一件僥倖的事。還有一事值得提起的，是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對日本東京進行大轟炸的時候，上面提到的河井仙郎已被炸死，他的住宅化為灰燼，他所藏的石鼓文照片不用說也會一同被炸燬了。三井所藏的原拓本不知是否安全無恙。如果那一套原拓本也被炸燬，那末這部書的印行要算是把一項文化遺產的遺蛻保存下來了。

石鼓的製作年代，據我的考證，是在秦襄公八年，周平王元年，即公元前七七〇年。唐蘭有不同的看法，他認為石鼓乃秦靈公三年作，吳陽上時所作。秦靈公三年為周威烈王四年，公元前四二二年，和我所見相差三百年以上。他的主要根據是文中四字作四，不作三，又屢見避字，即節一人身之吾字，字法均不古。然石鼓文四字均加之省文，秦

風懷公時詩有馮驥春秋齊靈公時之唐壺銘已有駟字。駟
省為四而不作三，不尾為異。易經中孚九二「我有好爵吾
與爾靡之」已有吾字。易經成書雖甚晚，然此文辭則採自
民歌，為時當頗古。吾印乃陰陽對轉，此風飽有苦葉毛傳
以為刺衛宣公詩中三見印字，均作為我字用。是則吾印
殆古時民間俗語，故於民歌民風中見之。石鼓文作者採
用俗語，故首於貴族詩歌中使用避字。由此可見石鼓中
有避字，並非不足證明石鼓之晚，倒反足以證明自我稱吾之
古。爾雅釋詁「印，吾也。」印，朕身甫余言我也。以印吾列在弟
一二位，亦足見此二字為古語。且文中稱天子為嗣王，乃
周王初即位時之稱。秦靈公三年周威烈王已即位四年，
殊屬不合。又全詩格調，與詩經中秦風及西周末年之二

雅甚為接近。如大雅車攻吉日諸詩自來以為宣王時詩，無異說，舉以石鼓文相比較，不僅情調風格甚相類似，即遣辭造句亦有雷同。凡此均足以證成我的說法，而於唐說則深相抵觸。

或許有人會懷疑秦之先而西戎雜處，至襄公時其生產狀況離遊牧階段當亦未甚遠。而石鼓諸詩頗為雅馴，表示秦人已有相當高度的文化，何以能夠驟然至此？我看這是容易說明的。這是因為周室東遷之後，有一部分太史作策之類的人員留下了，又做了秦人的官，替秦襄公司筆札，故爾做出了同西周王朝格調相同的詩。

石鼓文是詩。所敘述的內容主要是貴族階級的畋獵遊樂生活，可惜從詩辭中看不出多少秦人的社會史料。

詩中有「徒馭湯」(靈雨)、「徒馭孔庶」又「臣徒如章(嶂)」(秦敕)這樣的話。「徒」是徒卒，也可能是徒隸，可惜看不
出進一步的階級性。但從石鼓本身考察，關於秦襄公時
的生產概況，倒可以得到一些間接的了解。石鼓呈饅頭
形，這是古代石刻中僅見的一例。在這以前無此形狀，在
這以後也無此形狀。秦始皇帝的各種有名的刻石都是
沒有遵守秦人的這個傳統的。我的推測是這樣：這應
該就是游牧生活的一種反映。它所象徵的是天幕就如
北方游牧民族的宮廬，令人所謂蒙古包子。秦襄公時的
生產概況離游牧階段不遠，故在刻石上採取了這種形象。
這和祀神之地稱「時」相比照，還可以得到相互的印證。
時字當是從埶字轉變而來，雞棲垣為埶，獸畜棲止之處亦

可為塼。石鼓車工石有「雨邀即時句，賓即，即御即時，時乃塼之省文。遊牧也，集祀神之處，自當為獸畜棲止之處，故神祠亦因而稱「時」。石鼓是襄公作西時時的紀念碑，祠稱時而碑象天幕，即使不是生活上的直接反映，至少所體現的觀念離實際生活必不甚遠。

石鼓的石質為花崗石，質頗堅硬，因而頗為沉重。每鼓的重量究有多少，可惜無人衡量過，在抗日戰爭初起時曾運往四川，一石即以一卡車載運，其重可想。韓愈「石鼓歌」謂「十鼓祇載數駱駝」，那是他不曾目驗所想當然耳的話。石鼓運回京後，間存故宮中，至今尚未開箱，我自己也不曾目驗過。據說每石的底部尖削，蓋便插入地中不易動移，其為人工製造，非天然石可知。石質是否係就地取材，亦